

直面路遥的创作不足与局限

王鑫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当前,路遥研究日益走向一个狭窄的意义空间,重新反思路遥的创作,直陈路遥创作中的缺陷,对还原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路遥,继而深化路遥研究的内涵,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局限;创作理念;封建观念;中肯评价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5)03-0030-05

如今,路遥毋庸置疑是延安甚至陕西文坛的一张王牌,与其他富有争议的陕西作家不同,评论界对路遥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褒扬,提及路遥创作局限的论文少之又少,这无疑造成了路遥研究的狭窄和畸形,就连“直谏”陕西作家的酷评家李建军^[1],评价路遥时都秉持着敦厚与崇敬的态度。但是,作为文学界权威发言人,在读者、学者与作家之间的传播与对话起媒介作用的文学史家,在对待路遥的问题上,却一贯呈现出轻慢、遮蔽的态度,甚至存在无视的状况。所以,评论家们纷纷发声,争取路遥地位,提醒甚至拉拢文学史家的目光,希冀路遥的作品名副其实地成为真正的“王牌”,这也将路遥研究推向了一个更为不利的狭小空间。

2007年西安华商报登载了一篇忆路遥的专题报道《深情忆路遥,共论文化强》,出席会议的有陈忠实、李国平等知名作家及朱鸿、李星等知名评论家。会议气氛热烈,在场的每位与会人员都对路遥的作品进行了激赏,对他本人也进行了无限的缅怀。杨乐生说道:“路遥笔下几乎全是‘悲壮’二字,真正的好作品恐怕不能老是那个样子,不管立意、人物怎样,路遥的价值与其不足是紧密相连的。路遥的语言到底好不好?我觉得可以讨论。”这时知名作家、路遥生前好友高建群就打断了他的谈话,说到:“小说有时是一种粗放耕作,语言并不是第一位的。”^[2]这个小细节呈现出一种公开地针对与强制地认同,路遥研究也就在这一次次多方力量的拉锯之下显得仓皇失措、无处藏身,从而陷入了一种更为尴尬的境地。

路遥在精神遗产方面的意义,不用多作赘述。人们理解路遥的清苦、艰难,更为他“用生命写作”的态度动容。可以说,在路遥的精神价值方面,进行多大的赞扬都不过分。评论家们看重路遥“血祭”文坛的写作姿态,希望能够“中和”文坛现存的

物质中心主义之下盛行的功利炒作与浮躁虚泛之风。

但是,路遥终究是个普通人,不能将他神化;他在创作方面经验不足、成果不多等弱点也不能忽视。贾平凹就曾将路遥请下神坛,写道:“路遥不是累死的,他昼伏夜出,是职业习惯”,“有人说路遥是穷死的……但那个年代都穷呀,而路遥在陕西作家里一直抽高档烟,喝咖啡,为给女儿吃西餐曾满城跑遍。”^[3]

当我们深究了路遥的身体状况、生存状态及创作进展之后,即使像贾平凹般背负了“把路遥请下了神坛”的“罪名”,也要彻底地直面作家创作局限,还原一个真实的路遥;即使评论界对路遥进行着正面讴歌、过度褒扬,但只要是不合事实的内容,同样是对逝者的不尊重。评论家们应该在不丧失理智的基础之上,对其不足进行爬梳,理解更为真实的路遥作品。

一、文学写作经验的不足

(一)创作手法上的缺憾

路遥作品使用的现实主义手法,在当时那个创作手法百花齐放的年月,显得有几分另类。“在路遥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4]另外,“中学时期,路遥已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书籍。”^[5]由此看来,路遥深受苏联俄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和十七年时期以柳青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

路遥曾说:“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这是我第七次阅读《创业史》。”^[6]路遥从中汲取了很多创作手法和观念,但那种手法毕竟是十七年时期的主流。路遥在文学创作中借鉴柳青的方法,使他的前期作品出现

收稿日期:2015-04-20

作者简介:王鑫(1990-),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主题先行等问题,创作规范全部集中于无产阶级思想的范畴,从生活中搜集事实,再去印证结论与主题。

从他执意摒弃新生代手法对他的冲击,冷静执着地一再持守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可见其独立的意志。但是,在当时整个文坛推陈出新地涌现出“先锋派”、“新写实派”与“现代派”等创作手法时,路遥相对没有创新地运用中国几十年前借鉴苏联的创作手法,扬弃甚至不屑新兴手法,这可以说为他的作品造成了一定的缺憾。

路遥对新方法的引入有限,一定程度上运用了西方现代派的内心独白、意识流、多视角、多声部等理念。可是,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对描写日益发展的生活、审视逐渐分裂的文明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在他的前期创作中,这一问题还没有过分显露,但在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就越见其端倪。在驾驭这样重大的题材时,现实主义手法已不足以撑起时下的生活变迁。路遥运用的创作理念只是一番有限度的尝试,在对后世作家现实主义创作资源上,没有独特的拔高和重大的贡献,这也可谓其创作上的一个遗憾。

最为重要的不仅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钟情,也不仅他对“先锋”创作手法的忽视,而是无论哪种创作手法,路遥都没有进行创新地运用。若路遥能够吸取更多的新思路与新理念于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中,一定会使路遥的作品在专业角度上更具生命力。

(二)单一的主题范畴

路遥作品的主题单一,多描写城乡“交叉地带”人们的生存困境。在这一主流之下,催生出以下六个支脉。着重描写农民无知单纯又慷慨的性格特点的作品,如《卖猪》《人生》等。

以塑造生活中贤淑、自强,爱情中独立、果敢的女性形象为主的作品,如《姐姐》《风雪腊梅》《月夜静悄悄》等。

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如《惊心动魄的一幕》等,隐含了路遥的创作特点:偏好时事话题。即使是小话题的文章,他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涉及国际局势、国家政策内容的机会。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等描写农村生活的窘迫和艰难与人的精神裂变,反映大部分农民性格中自私、愚昧、贪婪的元素,与知足、保守、狡黠的人性常态。

路遥的作品时常出现农村“能人”形象,例如高明楼、刘立本、田福堂等。同时往往会设置一个类

英雄的“后生”,他们往往有着不俗的样貌、高尚的品格、出众的才华等。马建强、高大年,就是这类人物的雏形,高加林是他们的升级,而孙少安和孙少平是他们的升华。

另有一部分描写农村生活、讲述人物际遇与命运的作品。以农村的风云变化为背景,并将无产阶级思想准则置于作品之中,以此丈量真实的社会生活。

上述作家前期小说主题即构成了其后来长篇小说的大部分内涵,可见在创作主题方面截止《平凡的世界》,没有出彩之处,可谓路遥小说创作之遗憾。

(三)人物塑造的缺憾

在人物塑造方面,路遥基本沿袭以下三个阶段,以《人生》这部作品为界,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在他创作前期,一切都是从模仿和摸索开始,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存在着不够丰满的问题。中期创作,以《人生》这部作品为代表,表现出他对人物深刻地把握,不仅仅局限于好与坏的两面,着重表现在对高加林个性的刻画。在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之内,塑造出这样一位出彩人物实属难得,但是,对于其他人物的描写还是掉进了扁平化的深沼。第三阶段以《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为代表,人物形象的着墨在篇幅上均有着较为得体的比例,但是作者又像是回到了前期创作的怪圈,人物又被极度强调道德感、伦理性,反而失掉了人性该有的复杂与深刻。

金歌曾经在书中写道,路遥“将道德尺度过分看重,置于首位,几乎取代了历史的价值尺度……我们并不反对道德评价,但是道德评价要以历史评价为前提,历史评价要融于道德评价之中。”^[7]在《人生》中,作家的主题是想反映出城乡矛盾,但是却由于作家对于德性的持守,导致情节的流动向着“对挑战道德者的惩罚”的方向发展,从而让读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同情刘巧珍、谴责“陈世美”的故事模式之上,遮蔽了更为内隐的深层主题。

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继续发掘城乡生活的主题,与《人生》主要人物描写不回避人性多面与复杂不同的是,作者几乎在多数主要人物的塑造上均把守严格且单一的道德准则,致使这部作品人物刻画过于主观,描写尺度从作家自己的审美观念出发,而非以“历史评价”作为出发点。

作家在创作中再现生活真实、塑造人物个性的时候,往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反映生活时要注意“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必要在创作中将

生活中的枝节不分巨细地展现,同时也应该剪掉不合教养的粗鄙和无边的生活之庸常,文学应该是生活的超越、升华与对抗。第二,在创作中不该将人物发展完全按照作家自己的喜好来安排,进而导致人物个性不健全。虽然有人说:“文学创作就是说谎。”但再大的谎也不该摒弃人性该有的多面,反而趋从扁平。总之,路遥过多的遵循自己道德标准,普遍民众该有的多面向人格缺乏探讨,在人物性格发展过程中缺乏铺垫,这都是他在人物塑造方面难以回避的不足。

二、封建观念的残留

(一) 根固的门第观念

小说《人生》的情爱设置上,表现出对男女双方“外在条件”的看重,例如,文化程度、相貌、家境等,并且常常将人物父母的职位交代的清清楚楚。这都是作者为揭示男女二人在阶层和地位上的差别、为两人最终无法结合,埋下伏笔。高加林想:“他当然想和黄亚萍结合在一起。他现在觉得黄亚萍和他各方面都合适。她有文化,聪敏,家庭条件也好”,“家庭出身和经济条件的差别,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使他们天然地隔了一层什么。”^{[81]58}同时,高加林也将情爱结局与个人发展结合在一起,使原本纯粹的爱情,蒙上了一层功利的世俗色彩,也将朴实的农友描写得颇具现实功利意识。文中写道“如果他一辈子当农民,他和巧珍结合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是‘公家人’,将来要和巧珍结婚,很少有共同生活的情趣”^{[81]59}。高加林初到县城上班,生活情趣和知识水平尚未提高,但随着其身份的提高,择偶的眼光也跟着提高了,可见他不单是没有清理掉“门当户对”的观念,还长了县城攀高结贵的风气,妄图利用黄亚萍南京的关系,进入更大的世界。

在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与田润叶萌发感情,孙少安出于“门当户对”的考虑间接拒绝了这段爱情;农民出身的公办教师田润叶,面对市里高干子弟的爱情攻势,也存在着自己过于“高攀”的想法。最引发读者关注的是农民的儿子孙少平与市委书记的女儿田晓霞的爱情,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在路遥笔下成为现实,但是作者一样无法驾驭他们的结合,所以最终安排田晓霞“合乎情理”地牺牲。小说末尾,提到了孙少平的妹妹兰香,在大学与市里大领导之子交往,作者无力构架他们的爱情结局,虽然有着美好的预示,但这也存在着前提,即兰香考上大学、品学兼优、相貌不俗

以及“没有一点农村人的味道”等为和“城里人”的平衡准备了多重元素。可见,他笔下的优秀后生虽然某些条件不错,但终归没有涤荡掉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畸形地发展起来的封建婚恋观,具有典型的生存理性。

(二) 强烈的农村视野

作家对城乡矛盾的思考不足,甚至在这种关系的处理上显得过于主观,反思不够。高加林在县城拉粪时,由于影响了机关大院的气味以致一个妇女对他出言不逊“这些乡巴佬,真讨厌!”当下高加林想“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簸净,拣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给他们打扫卫生,他们还这样欺负乡下人!”^{[81]67}这里首先要说明,那个妇女的做法十分不厚道,但是高加林的心理也存在问题。他言及“农民把最好的都送到城里”,但这并非由于奉献精神,而是出于利益考虑,最好的粮食可以挣更多的钱。还有,来城里拉粪,也不是他们自愿的,而是想让庄稼增产。路遥在此所发的感想,将农民为了生存的必然行为,解读为无私奉献,未免有些冠冕堂皇了。我们理解那个年代农友生存的困境,也了解城市人们存在不良习气,但是由于中国贫富差距大,城乡发展不合理等诸多复杂原因造成的。路遥身为一位作家,将这种差距滋生的愤恨情绪,加诸于市民身上,作品中让城里人的性格理所应当、随心所欲地偏向“恶”,如此偏激地处理,也揭示了作家的思考不够成熟,对细节掌控欠缺考虑。

孙少平这个人物集作家的全部眷顾于一身,谈到自己的梦想时,竟是要“为父亲箍几孔窑洞”^[81]。可见即使是作者让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孙少平,在思想水平与精神高度上也不免俗地流于平庸。文中还存在着对陕北人民骨子里“先走为神”封建思想的余温,可见路遥思想观念里的“出走”意识还是没有被理智与知识的力量所清除。

另外,中国民众心里广泛存在的“官本思想”,即对政治官员的仰望、对领导决策的拥护、对干部出场的重写等方面在文中有所显露。杨光祖曾说,政治描写如果全部删掉,会让《平凡的世界》在艺术方面上升不少^[81]。但这不单是路遥一个人的创作缺陷,而是中国作家的普遍问题,例如池莉的小说,就对政治人物常常进行隆重的渲染;张平的反腐作品,也会出现概念先行、信仰最大的问题,以至于作品内容虽然热血沸腾,但不免失真。身为作家,对

政治人物的描写如此拔高,反映作家对“官员”,尤其“清官”表现出崇拜情绪,也隐示出路遥创作视域的狭窄和精神人格的渺小。

(三)性格缺陷的弱化处理

路遥本人博览群书,在书中塑造的农村“能人”的形象也是给予了过分的优长。即使出现潜在的性格弱点,也会被作家予以无限地同情甚至专意地改写。

路遥描写高加林去县城拉粪,和“先锋”队员发生冲突后,“他穿过一大片菜地。他知道这是‘先锋’队的。想起刚才车站的斗殴,他便鼻子口里热气直冒,跑过去报复似的摘了一抱西红柿。”^[8109]这实际上是偷盗行为,但作家却没有对他进行批判。这个细节,表现了高加林性格中极端、哀怨的弱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着“阿Q精神”的影子。

高加林进城工作是因为马占胜为其提供的“后门”,他欢喜地接受了工作机会,但内心认为马占胜、高明楼是“奸猾干部”,还说“马占胜虽然给他走了后门,但他在内心里并不喜欢他。”^[8129]高加林的上岗和马占胜的腐败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根本没有批判“走后门”这件事的立场。但是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将高加林描写成一个有才华的记者,和所谓的“奸猾干部”区别开来。

高加林写的第一封稿子,景老师未经修改就播放了,文中写道“景老师竟一个字也没有改”,但当黄亚萍来向他成为记者表示祝贺,赞其稿子写得感人时,高加林说“‘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头一次写这类文章,很外行,全凭景老师修改。’高加林谦虚地说,但他心里很高兴。”^[8133]初来机关大院的高加林,竟像是在社会浸淫多年一般,毫不脸红地说着无边的赞语。在此作家用了“谦虚”二字,表明了对高加林言语的满意与认可,以及对农村形象的极度青睐,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人格拔高,以致不辨优劣地大肆渲染。

孙少平把户口转到原西县的违规、去煤矿工作借助田晓霞父亲的影响、到煤矿体检时的作弊……这种种的不合规矩,作者都在文中进行了软化与弹性地处理,表现出作家对少平为代表的农民充满爱的笔触以及不避嫌的包庇。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作家把农民当作“弱势群体”对待,给他们宿命般的出身农民以同情与关爱,反衬出市民人性中的“恶”元素,以及作者对城市的隐性“仇恨”。这些均揭露出路遥的创作视野不够开阔,精神扇面不大,未跳出他身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的视角与观念。

(四)功利的求知欲望

路遥常常将“知识”无意识地蒙上功利色彩,他书中的人物往往借助知识的武装来区别于村中众人。同时,乡村青年也是通过知识来增加自己扭转命运的砝码。路遥本人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只有对自己能力进行提升,才有望减轻与城里人的界限。在他的作品中,笔下的主人公也是常常看《参考消息》,关心时事政治,这都表现出潜在的功利色彩,希冀利用知识改变命运的现实诉求。

《在困难的日子里》中写到,马建强想“如果我继续上学,说不定将来会成为工程师或者文学家。这样我就会改变我的传统的贫困家庭……要是我从此中断了学业,那我就不得不继承父亲的地位。这对我来说是极其难堪的。”^[10]写出了他想利用满身的才学闯出农村、脱离农村,为在城里谋得岗位准备条件。

作者在《人生》中这样写高加林“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87]直白的表明高加林读书的目的,让原本自觉的求知渴望被利用成为改变命运的桥梁。知识在与生存的较量中沦为了下等,才华、学识超越品德、人格,成为路遥笔下人物孜孜追求的关键所在。

三、结语

在面对路遥的问题上,许多评论家或抱着“逝者已矣”的态度,或秉着不忍直言的顾虑。但是,无论怎样,评论家们都不能因为敬仰路遥的创作态度而忽略自己的本分。陕籍评论家们对于逝者路遥的宽容与呵护,引发全国学术界对于他们“不专业”、“不敬业”的质疑。

作为资深的读者与入门的学习者,我们对路遥的主观钟爱与客观看待,二元要进行辩证地分析,观点看法也要进行层层甄别,只有摒弃主观好恶,才能得到更为中肯的结论。由于路遥本人创作经验的不足,造成小说存在硬伤是难以避免的,但也不能由此将他屏蔽于文学史之外。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一定的创新和优长,例如,他创新性多角度转换叙述场景就是为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新的探索。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在政治时代,将以经济单元置换为具有文化色彩的乡土视野,为后来发展起来的“文化小说”、“寻根小说”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总之,应该肯定的是,路遥在写作立场上存在着特殊的成就与标高,同时他的作品也为八十年代文学创作风格与模式起过一定的“过渡”意义。

正如周燕芬所说：“就当前的陕西文学来讲，创作与阅读都走在了前面，滞后的恰恰是批评这一维。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已经成为促发作家再创作的强劲动力，但批评家却满足于解释作品，迎合作家，进而拔高和吹捧，缺少独立的学术品格和批评的理论力度。批评既难以触动作家，也就谈不上

指导和提升作家的创作了。”^[12]陕籍评论家们对陕籍作家言语上地的照顾，造成了批评上的滞后，生成了一种作家、评论家互谋共利的奇异状况。陕旗大军面对陕西评论界相对空白的研究现状与不痛不痒的有限指点，无疑会造成批评家无力敦促作家创作趋于成熟的恶行循环。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七周年而作[J].南方文坛,2002(2).
- [2] 陈忠实,高建群.深情忆路遥 共论文化强[N].华商报,2007-7-30.
- [3] 贾平凹.怀念路遥[N].南方周末,2007-11-21.
- [4] 回忆路遥特辑[J].陕西文学界(增刊)(28-29).
- [5] 晓雷,李星.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348.
- [6]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 [7] 金歌.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意识[C]//张立文,王俊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54-255.
- [8] 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 [9] 路遥.平凡的世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73.
- [10] 杨光祖.论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创作误区与文化心态[J].社科纵横,2005(6).
- [11] 路遥.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254.
- [12] 周燕芬.文学观察与史性阐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10.

The Downside and Drawback of LU Yao's Works

WANG 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ignificance of Lu Yao's studies increasingly goes towards a narrow space. It is undoubtedly positive meaning that we should reconsider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Lu Yao and speak frankly defects in the works. 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restore true author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connotation of Lu Yao.

Key words: downsides; creative concept; feudal notion; accurate appraisal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29页)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Heroes' Soul Revenge by Tuomeng in the Drama of Yuan Dynasty

WANG Li-na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723000)

Abstract: Heroes' soul revenge by tuomeng has a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he drama of Yuan Dynasty. Fame caused the different life consciousness between heroes' ghosts and civilian ghost. Profou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Yuan Dynasty created a strong sense of revenge of heroes' soul. Playwright's creative mind and aesthetic tastes of the audience als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ghost tuomeng consciousness traced back to the ghost belief culture.

Key words: drama of Yuan Dynasty; the ghost drama; tuomeng reveng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周锦鹤)